

湖北省宗教研究会／编

宗教研究

湖北

佛教自两汉之际入华以来，就一直走在的道路上，搏斗、奋进。不过，虽说华严唯识宗法相宗、净土宗、三诸多教派等，最为彻底的是禅宗，本土化和中国哲学简史中区的中国的佛学”，并以禅宗为“中国佛教”，“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页。然而，禅宗的真正发祥地不在地区。众所周知，禅宗的革新主要面：一是在教义上，不可不



宗教文化出版社

湖北宗教研究

湖北省宗教研究会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宗教研究/湖北省宗教研究会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ISBN 7-80123-607-6

I. 湖… II. 湖… III. 宗教-文集 IV.B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714 号

湖北宗教研究

湖北省宗教研究会 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版式设计: 司博文 陶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37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书 号: ISBN7-80123-607-6/K·155

定 价: 28.00 元(内部发行)

编委会

主 编:段德智

副主编:赵崇辉 陈卫东 周庆章 官哲兵

编 委:张化平 李爱旻 邓汉光 余 鹏

序 言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宗教是由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又同一定的政治、哲学、文化、道德等意识形态相结合,是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文化现象和社会实体。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存在宗教。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宗教都值得专门研究。尤其是当今世界,宗教问题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和地区因民族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发的矛盾冲突不断,时常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宗教工作者和宗教教职人员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

为顺应时代要求,一批有识之士于1999年发起成立了湖北省宗教研究会。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宗教及宗教工作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为党

和政府的宗教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为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繁荣社会科学事业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研究会成立以来,会员们在宗教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不断探索,写出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和调研报告。这本书就是会员们近年来在宗教研究领域里主要成果的集结。书中有些文章曾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的有关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曾在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上交流,有些文章曾获得过省部级的优秀理论成果奖。全书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对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分析,举凡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民族、宗教与历史、宗教与现实、宗教与社会、城市宗教问题、农村宗教问题、宗教事务管理问题、宗教教职人员培养以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等都有涉猎,反映了会员们紧跟时代步伐的思想敏锐性和努力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这本书对于从事宗教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从事宗教事务管理的实际工作者、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以及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都会有所帮助。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也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因此,我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也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使我们的宗教研究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可以预料,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在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的宗教研究工作一定会再上新台阶,日臻新境界。

苏晓云

2003年11月24日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序
言

引 言

湖北省“得地独厚”。《尚书·禹贡》记载：“江汉朝宗于海”；《诗经·大雅》又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都对以世界第三大河万里长江为中轴、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湖北省的地理优势作了肯定和称颂。然而，湖北省的地理优势不仅在历史上促成了湖北省的经济优势，并使湖北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刚勇气质，而且还成就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荆楚文化，使湖北省成为一个宗教文化和宗教研究大省。

早在中国宗教的原始时期，湖北人就别具一格地创造了鸟图腾文化。《离骚》中所谓“凤凰受诒”的说法，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的一种写实和追忆。至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荆楚文化更构成了我国古代宗教（道教）孕育生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源头。《国语·楚语》观射文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屈原《九歌·山鬼》中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的诗句，《九歌·国殇》中有“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以及“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诗句；屈原《离骚》有“巫咸将兮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应”的诗句。这些都说明神道巫风历来是荆楚文化的一项



重要内容和根本特征,而以浓郁的神道巫风为本质特征的荆楚文化无疑对我国道教,特别是对符箓派(正一派)道教的酝酿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广的影响。至于作为荆楚文化元典之一的《庄子》中“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等关于神人、至人、真人的形象刻画,以及《九章》中“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对升天景象的生动描绘,无非是对湖北人神仙崇拜的形象表达,而湖北人的这种神仙崇拜无疑对我国道教的酝酿产生有着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影响。不仅如此,湖北西北部的武当山还是我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据《武当福地总真集》等文献记载,早在东汉以前,该山就有一些著名的隐士或道人,如清灵真人斐玄仁(生于公元前178年),得“玄真之法”的戴孟(汉明帝时人),得“太阳神丹”之秘的马明生,食丹成仙的阴长生等,都是早期丹鼎派的著名人物。据《后汉纪》、《后汉书·皇甫嵩传》以及《三国志·张鲁传》载,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武当山附近的南阳地区和汉中地区曾有极大的势力,这也充分说明了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道教符箓派在湖北地区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至我国道教形成之后,湖北武当山就一直被视为道教仙境和修炼圣地,一批又一批的著名道士,如东晋时期的谢允、唐代的吕洞宾、五代宋初的陈抟、元代的张守清、明代的张三丰等都曾长期在此修炼,并逐步形成了以崇奉玄武—真武—玄帝为基本特征,融武当本山派、全真派、清微派、神霄派、茅山派等为一体,对全国道教有“四海流传、十方皈响”重大影响,甚至一度攀升为“玄岳”和“天下第一名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道教派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湖北道教史(武当道教史)也就是一部我国本土宗教(道教)萌生和发展的历史。

湖北省不仅在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



有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而且在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方面也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佛教自两汉之际入华以来,就一直在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道路上挣扎、奋进。不过,虽说我国佛教有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法相宗)、净土宗、三论宗、律宗、密宗等诸多教派,但在佛教本土化和中国化方面做得最为卓越、最为彻底的则是禅宗。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区分了“中国的佛学”和“在中国的佛学”,并以禅宗为“中国佛学”的典范,强调指出:“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①然而,禅宗的真正发祥地不在别的地方,正在湖北地区。众所周知,禅宗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一是在教义上,以“不可说”为第一义,强调“不知之知”;二是在修行方法上,强调“不修之修”和“无得之得”;三是在僧团生活方式上强调“农禅结合”,“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虽然达摩一祖在嵩山少林寺创造了以“壁观”、“理入”为名目的新禅法,功不可没,但上述三项革新毕竟都是由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开创“东山法门”真正实现和奠定下来的。而且,此后禅宗的两大宗系,即所谓北宗和南宗也正是由湖北人弘忍的两大弟子神秀(倡“即心即佛”)和慧能(倡“非心非佛”)开创的。任继愈先生在一篇题为“弘忍与禅宗”的专论中强调:“弘忍和他创立的‘东山法门’在隋唐各大宗派中是最有创造性的一派。”又强调说:“弘忍继承了道信的禅法,经过发扬和改进,奠定了后来南北各流派的基础,后来许多流派的禅法基本上出自东山法门。”^②此乃不易之论。

然而,湖北的宗教文化和宗教研究不仅在我国古代宗教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② 萧楚父、黄钊主编:《“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文化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我国的近现代宗教文化史上也享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民国时期,湖北宗教在推动我国社会转型的革命活动中,就做出了不凡的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当道教在多方支援贺龙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开辟、巩固鄂西北武当山革命根据地中做出了不朽的功绩;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国民党政府第五战区大后方的武当山及武当道教,又为我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如此,湖北宗教,尤其是湖北佛教,在推动和促成我国宗教转型的变革活动中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湖北佛教不仅如前所述在佛教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方面功勋赫赫,而且在推进我国佛教的现代化方面也成绩斐然。湖北籍僧人月霞(1858-1917年)早在清末就曾在江苏、湖北创办僧教育会,在南京设僧立师范学院,晚年又在杭州和常熟创办和续办了华严大学,可谓开了我国现代佛教教育的先河。至于民国佛教改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太虚法师,虽然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和建立新式僧伽制度的改良主张,但他的改良思想的系统阐述和发挥,特别是他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确立和系统阐述,与他在湖北地区的讲经活动是分不开的。尤其令人瞩目的是,1922年太虚亲自创办的以太虚任院长、以梁启超为其董事会第一任董事长的武昌佛学院,在我国现代佛学史上,享有卓越的地位,成为太虚后来佛教改革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不仅为出版《海潮音》月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在筹建“世界佛学院”和“世界佛学院图书馆”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1924年由美国圣公会和英国伦敦会等教会组织联合创办、由韦卓民长期担任校长的华中大学,在我国教会大学史上也享有比较高的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社会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变,为我国宗教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湖北宗教文化和宗教研究



也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这不仅表现在湖北宗教界不断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切实坚持“三自”方针(“自治”、“自养”、“自传”),以及湖北天主教在全国率先实现自选自圣等等方面,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湖北学术界,包括湖北籍的学者和在湖北工作的学者在内,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具体、深入和富有成效地开展宗教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湖北籍(在外地工作)的学者中,最为杰出的当推熊十力和汤用彤父子这三个鄂东人。湖北黄冈人熊十力早年曾入南京支那学院师从欧阳渐先生潜心研究佛法,后致力于对唯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除《新唯识论》(1932年)外,还陆续著述和出版了《体用论》(1958年)、《明心篇》(1959年)和《乾坤衍》(1961年)等论著,成为我国现代“心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为佛教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湖北黄梅人汤用彤作为一代佛学大师,曾先后著述和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初版,1955、1962年再版)和《隋唐佛教史稿》(1982年)等专著,第一个揭示了佛教和道教、玄学和佛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子汤一介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年)、《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1988年)和《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1992年)等论著,更进一步从儒道释的互动中来阐释中国宗教的发展。在湖北工作的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有陈修斋、萧箴父、唐明邦等先生。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译出了法国神学家戴业芳的6卷本著作《历史中的耶稣》,其中1—5卷《他的来临》、《他的音容》、《面向死亡》、《战胜死亡》和《历史的基础》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51年陆续出版;之后,他又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商务印书馆,1962年)。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萧箴父先生先后与人主编出版了《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1990年,另一个主编为罗炽教授)和



《“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年,另一个主编为黄钊教授)等论著和论文集,在我国道教学界和佛教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另一个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唐明邦先生对佛教和道教也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不仅于1988年在全国率先创办了省级道教学术研究机构——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而且于1990年还与人一起发起并组织了全国“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为推动和促进我国新时期的道教文化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湖北省的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这就是既为湖北籍又在湖北长期工作的章开沅先生。多年来,他主持和领导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作了大量工作,不仅组织编译出版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而且还主编出版了“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为我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1997年,武汉大学继北京大学之后在我国高等学校第二个设立宗教学系,并随后增设了宗教学硕士点、博士点,招收宗教学本科生专业,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湖北省作为宗教研究大省的地位。

湖北学术界加盟湖北省的宗教研究,不仅使湖北省的宗教研究队伍更具规模,使湖北省宗教界的宗教研究力量与湖北省高校的宗教研究力量在宗教研究中形成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格局,使湖北省宗教研究的整体实力和整体水平有了本质的提升,而且这样一种局面和形势也向湖北人提出了筹建一个机构,以便进一步沟通和联合湖北省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宗教研究力量的任务或使命。1999年11月成立的湖北省宗教研究会,就是这样一个在湖北省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的直接关怀下,在湖北省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下,应运而生的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宗教研究会成立之后,不辱使命,千方百计开展各种宗教研究活动,除组织召开了几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外,还以不同形式组织召开了多次规模不等的研讨会。收入本论文



集的43篇论文,除个别外,即是从这些会议论文中精选出来的。这些论文的作者有的来自宗教界,有的则来自学术界和宗教事务管理界。本论文集分5个部分,这就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反邪与神学建设”,“宗教工作与宗教事务管理”,“宗教与文化”和“湖北宗教”。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根本目标,也是新时期宗教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因此,几年以来一直是湖北省宗教研究会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收入这一部分的9篇论文可划分为三个小组,依次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思想基础和工作策略问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以及宗教同社会政治稳定、“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在讨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工作策略问题时,相关论文强调指出“真正的适应应该是思想上的适应”,而“相适应的基础”则是社会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应该说,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另一篇相关论文则不仅在解析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的基础上强调和论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性,而且还具体地探讨了“如何积极引导”的问题:一是“尊重宗教信仰,激发宗教界内动力,善于引导适应”;一个是“依法管理,营造社会外推力,不断促进适应”。这些经验之谈看来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昌明法师的第一篇文章从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高度,不仅多方位地讨论和论证了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还从“人生佛教的实践”、“农禅并举的传统”和“佛学现代化的进展”等维度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问题。他的第二篇文章不仅进一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宗教问题上的失误”、“毛泽东思想宗教观的形成”、“党的宗教政策的完善”以及“新中国宗教的巨变”等5个方面阐

述了“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缘起”，而且还具体深入地探讨了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及主客观条件。他的这两篇精心之作无疑是太虚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在新时期的一个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正慈法师的文章着重从佛教自身的改革和现代化的角度讨论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强调佛教为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需要进一步“坚持正信，继承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与时俱进”、“面向当代，开拓未来”、在实践中不断地“寻找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切入点和结合点”。这一部分的最后三篇论文在论述宗教的社会功能和道德伦理功能的基础上具体深入地讨论了新时期我国宗教如何以及何以可能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贯彻“以德治国”方针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相关文章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厘定为“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促进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祛邪匡正”和“引导广大信众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确定为“发挥佛教道德优势，积极促进以德治国”的三项根本举措，这些意见是否精当，自然有讨论的余地，但无论如何，也是一家之言，有值得重视之处。最后一篇论文，也同样如此。对儒学宗教性的讨论是20世纪儒学研究中一项重大事件。虽说人们对“儒学是否宗教”依然各执一词，但对儒学之具有宗教性则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本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从本体论的高度，即从存有的层次性和终极性的高度论证了儒学的宗教性，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针对此前的有关讨论对于“儒学的宗教性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关联或意义”缺乏应有的关注而着力探讨了这个问题。文中对儒学的宗教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具体说明虽然只是作者的一个初步尝试，难免挂一漏万和粗疏，但是其抛砖引玉的用心则是应当予以肯认的。

既然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根本





目标,既然这种适应首先和根本上是思想上的适应,则支持宗教界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就势必构成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乃宇宙万物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自然也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一条无可更易的规律。张三丰说:“古今有两教,无三教。悉有两教?曰正曰邪。……圣人之教,以正为教。若非正教,是名邪教”,也是谓此。^①正因为如此,神学思想建设必须同宗教反邪紧密结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收入这一部分的7篇文章便可划分为两个单元:前三篇文章相关于宗教反邪,后四篇文章则直接相关于神学思想建设。该部分第一篇文章首先强调了对当代中国邪教孳生、蔓延的社会文化根源作深层次理论分析的必要性,指出:这种探讨“不仅对于邪教的‘治本’工程,对于依法防范、监控邪教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邪教的‘治标’工程也是绝对必要的”,接着对我国邪教孳生、蔓延的国际根源、社会根源、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做了比较具体比较深入的分析。相信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层次地认识邪教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本质以及同邪教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有益的。第二篇文章则在对“当代中国邪教的主要活动特点”做出具体考察的基础上,“对防范抵制邪教发展的对策”作了相当认真的探讨和解说,不仅提出了“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综合治理的防控网络”的宏观设想,而且还具体地阐述了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举措。这对于我们的防范处置邪教工作无疑有借鉴意义。第三篇文章的意义,主要的还不在于它对邪教所作的具体批判,而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了宗教反邪的具体策略,即“去伪匡正”,通过去伪而匡正,另一方面它又突出地强调了宗教反邪的重大意义,指出:“惟有宗教界人士的反邪才能够更好地从宗教内在本质的层面深入批判邪教,才能更好地收到

① 《张三丰全集》,方春阳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3页。

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更有力地打击邪教;另一方面使我国各宗教在反邪斗争中更加健康地沿着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前进,并使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更加全面彻底的贯彻。”接下来的几篇文章虽然讨论的都是神学思想建设问题,但侧重点却有所区别。其中前两篇文章首先着重探讨了“坚持三自原则”同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坚持三自原则乃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神学思想建设乃“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和深化”,同时又强调和论述了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指出: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是“引导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神学体系的必须”,是“抵制渗透和异端邪说的需要”。应该说,这些论述都是比较中肯的。至于最后两篇,虽说一篇关涉的是近现代,一篇关涉的是古代,一篇关涉的是基督宗教,一篇关涉的是佛教,但主旨却是一样的,这就是: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一向是和依然是我国神学思想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两篇文章的根本意义正在于告诉我们:对于外来宗教来说,神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神学思想的现代化与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是一致的和同步的。



31

该论文集的第三部分集中讨论“宗教工作和宗教事务管理”问题,有13篇文章,是本论集中篇数最多的一个部分,其中前面10篇讨论的是宗教工作问题,后面3篇集中讨论的是宗教事务管理问题。在讨论宗教工作的10篇中,前三篇着重从宏观上讨论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后面七篇则依次讨论了新时期宗教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其中第一篇文章着重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探讨了我国新时期宗教工作的“立足点”、“着力点”和“归宿点”。第二篇文章则主要从“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从容应对”、“求同存异,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要在积极‘引导’上下功夫”、“急不得,

言

13